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体例述论

刘天振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 明代是文言小说汇编的鼎盛时期。小说汇编之作并非小说资料的随意堆积,而是灌注了编者的主体意识,编纂体例选择即是其主体性展示的一个重要方面。明代文言小说汇编较有代表性的体例有:编年体、分类体、类书体、编年与分类混合体、主题论证体。这些体例在整合小说资料、表达编者意旨方面各自发挥了独特功能。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之所以能广泛汲取历史上各类文献编撰体例之长,为“我”所用,是由古代小说“位低而纳众”的本体性特征所决定的。明代是小说观念成熟自觉的时代,文言小说汇编体例与集部诸文类之关系也很值得探讨。

关键词: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编纂体例;主体性展示;编纂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6-0254-06

Discussion on compilation styles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LIU Tianzhen

(Jiangnan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booming period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 compilation. Fiction compilation isn't the random accumulation of fiction materials, but contains editors' subject consciousness. The selection of compiling style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ts subjectivity display. The representative compilation styles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include: chronology, classification, style of reference books, mixture of chronology and classification, and theme argumentation. These styles play a unique role in integrating fiction materials and expressing editors' intentions. The reason why the compi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can widely draw on the strengths of various types of document compilation styles, and can be used by us, is determined by the "low and inclusiv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fictions. The Ming Dynasty is an era when the concept of fictions was mature and conscio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ilation styles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s literature type also deserves discussions.

Key words: compi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compilation style; subjectivity display; compilation value

“汇编”可以说是相对于“创作”而言的一种文献形成方式。在刻书业高度发达、私人藏书量剧增等

因素直接推动下,明代迎来了文言小说汇编的鼎盛局面,其文献类型主要有小说总集、小说类书、小说

收稿日期:2019-01-23 网络出版日期:2019-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W078);浙江师范大学第七期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项目(NO.3)

作者简介:刘天振(1968—),男,山东巨野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的研究。

丛书三类,三者的数量达到一千种以上。目前学界对这批小说文献的研究尚处于现象描述^①、个案研究^②及宏观层面的价值判断阶段。其中,对这些小说价值的判断主要聚焦于其资料价值和文体学价值、扩大小说影响等方面。如陈大康^[1]认为,这些汇编之作“无论是对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的创作都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而且它们又构成了巨大的素材库”;“其流传无疑地扩大了小说的影响,提高了小说的地位”。陈国军^[2]从选本角度阐发其在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多种小说汇编对相对固定的小说篇目的多次选择,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王炜^[3]在辨析明末清初“说部”与“小说”概念差异时,以李如一编小说丛书《藏说小萃》为例,论述了小说汇编对“说部”内涵的丰富与规约。而对于微观层面的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的体例选择问题,学界迄今鲜有触及,因此本文拟探讨此问题。

众所周知,任何汇编之作皆非冰冷资料的随意堆积,而是编者主体性展示的一种方式。所谓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显示的自觉能动性。具体说来,它包含有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创造性等内容。”^[4]明代许多文言小说汇编者于序跋中表明其体例选择之意图,施显卿纂《古今奇闻类记》十卷,分为16类:天文纪、地理纪、五行纪、神祐纪、前知纪、凌波纪、奇遇纪、骁勇纪、降龙纪、伏虎纪、禁虫纪、除妖纪、馘毒纪、物精纪、仙佛纪、神鬼纪,其自序论及分类意图云:“常必有变,理之相因,如暑寒昼夜然。人惟顺适乎常,而兼通夫变,斯知大化有全功,而穷理无偏见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运播而五行,散殊而人物,灵变而仙释,幽微而鬼神,分门别类,以备一家之言。”^[5]其纂辑此书旨归在于阐述其对于宇宙间“常”“变”关系及人类因应之道的见解,而所分十六类及编排次序则是其见解的图解方式。穆希文辑《说原》十六卷,共分5部:原天、原地、原人、原物、原道术,其自序对分部及编排旨意作了告白:“先之以天地者,人物之祖也;次之以人物者,天地之所生也;而道德、艺术又自人而为之,故以道术终焉。此盖文欲尽博我识,以格物无遗也。”^[6]可见,“尽博我识,格物无遗”是其体例布局的终极旨归。李登为焦竑纂《焦氏类林》所撰引言更直接揭示:“一经编纂,便寄精光”^[7]。明代很多文言小说汇编文本经过了纂者匠心独运的策划,它们广泛借鉴历史上各类文献体例之长,选择最适切其旨意表达的体例。本文拟从编年体、分类体、类书体、分类与编年混合体、主题论证体等方面展开讨论。

一、编年体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的取材范围,有不少是自古迄今、纵贯历代,尤其是那些用“古今”“XX史”命名的纂著,乐于采用编年之体编排资料。陈邦俊《广谐史》十卷即为编年之体,其《凡例》云:“是集始于唐,由宋、元迄明,止序世次”^{[8]207}。其卷前的《总目》自唐、南唐、宋至元、明编排而成。其《采集书目》亦依朝代次序编列。陈禹谟编《广滑稽》三十六卷按典籍的成书时代顺序,摘抄滑稽故事,如卷一《史记》,卷二《汉书》《后汉书》,卷三《魏志》《蜀志》、裴松之《曹瞒传》《典论》《魏书》《魏略》《典略》《管辂别传》《汉晋春秋》、孙盛《杂记》《吴书》《吴录》《江表传》《诸葛恪传》《志林》《文士传》。郭子章辑《六语》三十一卷,包括《谚语》《谣语》《隐语》《讥语》《讪语》《谐语》6种,每一种都是按时代顺序辑录故事,如《讪语》卷一为《唐虞》《夏》《商》《周》《晋》《鲁》《秦》《前汉》《后汉》,卷二为《魏》《蜀汉》《吴》《晋》《苻秦》《石赵》《刘宋》《南齐》,卷三为《梁》《元魏》《高齐》《隋》,卷四为《唐》《五代》,卷五为《宋》《元》,卷六为《大明》。总体上以朝代顺序为纲,但在周朝、三国、南北朝时期,它又穿插了国别体,不过这种变通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易于为读者所接受。汪云程编《逸史搜奇》杂采汉、唐迄宋小说140种,汇为一编,中分十集,辑入众多唐宋传奇、志怪小说的精品。佚名辑《五朝小说》按照时代顺序分别辑录魏、晋、唐、宋、明五个朝代的小说作品四百余种。

编年体例之长在于,可以展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9]的文学发展规律。陈邦俊《广谐史凡例》明确提出,其书“止序世次”,宗旨在于表达他的文学发展观:“见文章与时高下,气运文脉按策可观,而诸名公精神,直旦暮遇之矣。”^{[8]207}

二、分类体

所谓分类体,指依据不同主题分类编排而成的小说书籍,其不受特定分类体系羁约,类项设置、类目数量的随意度较大。此类小说汇编的数量众多,

① 如刘天振《士风、学风、藏书风转变造成的文学奇观——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汇编繁盛原因新探》,载于《南开学报》2012年第5期,第35-43页;孙逊、秦川《明代文言小说总集述略》,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40-48页。

② 如刘贝贝《明代“艳异类”小说选本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俞颂雍《〈古今说海〉考》,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除了分类体总集,还有诸多小说丛书也是分类编排的。倪绶编《群谈采余》十卷,分58类:

天文、地理、时令、花木、禽兽、诸兽、昆虫、衣服、饮食、宫室、器用、文史、杂记、忠义、正直、附宦、廉介、识见、德量、矜急、推恩、明断、科第、幼聪、敏捷、前定、神仙、箕仙、僧梵、清逸、讥议、际遇、退隐、阴鹭、交情、知人、伤感、诗祸、家教、贞烈、贤淑、附妓婢贞烈、知足(俭足)、戒贪、怪异、风怀、色迷、淫秽、悍妒、谄诈、谄媚、节逆、术数、祸讖、疑解、考证、辨惑、戏谑^①。

类目下并列故事,不撮标题,类例近于《世说》之体。程时用辑《风世类编》十卷,分为10类:祥使、咎征、孝友、臣鉴、交谊、壶懿、分定、梦征、谕冥、物感。何镗《高奇往事》十卷,先分“高苑”“奇林”二类,再分别分析子类5个,前者下分:高行、高节、高论、高致、高义,后者下分:奇行、奇言、奇识、奇计、奇才。

“古吴冯梦龙评纂”《太平广记钞》八十卷,有明天启六年(1626年)沈飞仲刻本,卷首有李长庚的《序》和冯梦龙的《小引》。《太平广记》原书按题材分为92大类,除了末二类“杂传记”“杂录”,其余90类皆属于主题分类。冯氏将其合并为81大类,例如他把“神仙”“女仙”两类合并为“仙部”,把“道术”“方士”二类合并为“道术”类,等等。梅鼎祚《青泥莲花记》13卷,专记倡女之行事,内编分7门:记禅、记玄、记忠、记义、记孝、记节、记从;外编分5门:记藻、记用、记豪、记遇、记戒,实分12类。诸如《益智编》《智囊补》《智品》等智慧故事书,都是分类编排而成的。

明代许多小说丛书在总题名之下,也是分类编排的。如《古今说海》《合刻三志》《绿窗女史》《八公游戏丛谈》《古今逸史》《夷门广牍》,以及《五朝小说》之“魏晋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等等,皆是如此。如秦淮寓客编《绿窗女史》一百九十四种十四卷,先分“闺阁部”“宫闱部”“缘偶部”“冥感部”“妖艳部”“节侠部”“神仙部”“妾婢部”“青楼部”“著撰部”等10部,“部”之下再分45子类。

一些分类体小说汇编时,其类目编排颇费匠心。有的类目题意正反相对,构筑材料对照结构,生成文本内在张力。程达辑《警语类抄》八卷,分60类,编者《凡例》明言:“汇编各有条目,而‘俭类’附‘奢’,‘忠类’附‘佞’,‘清类’附‘贪’,‘仁类’附‘酷’,‘正类’附‘谗’,‘乐类’附‘忧’,‘巧类’附‘拙’,则各从其类,以便观览。”^{[10]47}庄言法语,枯燥说教,易招睡魔。因此,有的编者还注意到读者接受过程中心理情绪

的调节。程达《警语类抄凡例》说:“编中义从经史来者,读之自是神竦,间有谐语并收,可为鼓掌之资者,要亦足为警省之助。”^{[10]48}有的类目编排顺序隐含编者的品鉴意识。樊玉冲《智品》十三卷将人之智慧品分为七等:神品、妙品、能品、雅品、具品、谨品、盗品,前五品与后二品也隐含正反褒贬的对立结构。王圻《稗史汇编》“人事门”(第八十四卷至九十六卷)模仿《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品阶进行分类展示,亦暗藏褒贬对照之结构。叶向高辑《说类》六十二卷中,与人事相关的门类,其资料与类目亦往往扬抑相映。江盈科《皇明十六种小传自叙》中详述其编纂动机及编排构思,即用四维(忠、孝、廉、节)、四常(慈、明、宽、慎)、四奇(隐、怪、机、侠)、四凶(奸、谗、贪、酷)等十六种伦理及审美范畴纵横交织的网状结构结撰全书。

主题分类体特别适合专题性说部汇编,编者可根据其对专门领域掌握的深度、广度,设置不同的主题项目,如言情类的《情史类略》、智慧故事类的《智囊补》、志怪类的《异林》,等等,各有其独特的分类体系。因为文体与题材是一种表里关系,所以主题分类也是窥探编者小说观念的一扇窗口。^[11]至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中所说,子书中最为浮夸而难究的众说,有“博于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言者、事者”^[12],多可归入专题类的说部之书,往往采用主题分类方式编纂而成。同时,分类体也便于检索,以方便读者。谢应宸所撰《益智编》识语云:“是编专取古人临事之智,分类错陈,以便披阅”^{[13]667}。詹景凤《古今寓言·凡例》称:“采录及于古今,众言殫矣,惟以‘天文’等门类为编目,庶因次叙而便省览,若其世代,姑无论焉。”^{[8]6}

三、类书体

类书是我国古典文献的一个大宗。依据其形式及功能,类书可分为许多种。文中所称“类书体”,专指辑辑四部资料的综合性类书。张涤华所说“凡荟萃成言,哀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14],即指此类标准的类书。胡道静称其为正宗类书:“我们现在所说的类书,就是兼‘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正宗的类书,也就是这种性质的古籍。”^[15]正宗类书可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为代表,其分类体系一般由天文、地理、人事、众物、祥瑞、灾异等构成,体现“天人合一”思想。所

① 《群谈采余》所据版本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倪思益刻本。

谓类书小说集,即指借用正宗类书体例纂辑而成的小说书籍。类书体小说汇编的分类体系大致同于《艺文类聚》等综合性类书,如王圻《稗史汇编》¹⁷⁵

卷,分纲目为28门,纲目之下再分二级类目320个。《艺文类聚》一级类目46部与《稗史汇编》一级类目28门对照见表1。

表1 《艺文类聚》与《稗史汇编》一级类目对照

《艺文类聚》一级类目(46部)	《稗史汇编》一级类目(28门)
天部、岁时部、地部、州部、郡部、山部、水部、符命部、帝王部、后妃部、储 宫部、人部、礼部、乐部、职官部、封爵部、治政部、刑法部、杂文部、武部、 军器部、居处部、产业部、衣冠部、仪饰部、服饰部、舟车部、食物部、杂器 物部、巧艺部、方术部、内典部、灵异部、火部、药部、香草部、宝玉部、百 谷部、布帛部、果部、木部、鸟部、兽部、鳞介部、虫豸部、祥瑞部、灾异部	天文门、时令门、地理门、人物门、伦叙门、伎术门、 方外门、身体门、国宪门、职官门、仕进门、人事门、 文史门、诗话门、宫室门、饮食门、衣服门、祭祀门、 器用门、珍宝门、音乐门、花木门、禽兽门、鳞介门、 征兆门、祸福门、灾祥门、志异门

注:《艺文类聚》所据版本为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稗史汇编》所据版本为明万历年间刻本。

二书总体上都是按照天、地、人、事、物、灵异的顺序编纂而成的。与正宗类书的逐层分类一样,《稗史汇编》每一门之下又分子类若干,如“志异门”下再分15类:总记、灾祲、神异、人异、事物、水土、玉石、谷食、动物、植物、宫室、器用、邪鬼、妖怪、祛妖。

叶向高、林茂怀同编的《说类》62卷,总分45部,加上2个附部,共有47部,其分部情况与《稗史汇编》稍有差异:

天文部、岁时部、地理部、帝王部、后妃部、储戚部、宰相部、官职部、臣道部、政术部、刑法部、礼仪部、歌乐部、凶丧部、文事部、武功部、边塞部、外国部、科名部、世胄部、人伦部、人物部、妇人部、身体部、人事部、释教部、道教部、灵异部、方术部、巧艺部、居处部、货宝部、玺印部、服饰部、饮食部、器用部、杂物部、灾祥部、果部、草部(蔬附)、木部(竹附)、鸟部、兽部、鳞介部、虫豸部^①。

其沟通天人的“灾祥部”置于草木、鸟兽等“物”之前。其“部”之下再分二级子目若干,如“虫豸部”下又分17类:蝉、蜘蛛、蝗、雪蛆、蜻蜓、蜥蜴、蜈蚣、蜗牛、蝎、水蛭、螺赢、蝙蝠、蜣螂、巨蚁、度古、消面虫、异虫。

以上所列两种均是二级甚至多层分类小说汇编,其内容既有叙事性作品,也有杂俎式资料,因而具有“说部资料汇编”性质。以下所举两种则为单层分类的类书体小说集。

王瑩编《群书类编故事》二十四卷,分18类,模仿正宗类书的分类体系。其分类情况如下:

天文类、时令类、地理类、人物类、仕进类、人伦类、仙佛类、民业类、技艺类、文学类、性行类、人事类、宫室类、器用类、冠服类、饮食类、花木类、鸟兽类^②。

该书共辑录故事825件。李琪枝辑《清异续录》

三卷,“续陶穀《清异录》而作,穀书皆载唐末五代近事,此则皆采古书。穀书分37门,此则并为天文、地理、君道、官志、君子、女行、么麽、释族、仙宗、人事、词苑、艺能、肢体、居室、衣服、妆饰、陈设17门,‘女行’之末又附载“妇女双名”一门,体例颇不相同。”^{[16][1235]}《群书类编故事》与《清异续编》二书与前二书的主要差别在于:其辑录的基本都是叙事性材料,性质近于现代的“小说”故事。实际上它们仅仅把类书体例作为一种编辑手段。

类书体小说集的优势在于,借用类书的体例框架,将繁琐芜杂的说部资料汇整起来,依托类书的影响力,尤其它的分类体系反映主流意识形态,说部汇编亦可堂而皇之进入学术研究殿堂,客观上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同时,由于类书是传统博物学的典型文体,也有裨于将小说拉入知识史的视域进行观照,^[17]有助于后人深化对于小说本体性的认识。可见,类书体例之选择是编者意图的一种婉转表达方式。当然,分别部居亦能便于读者的选择性阅读,叶向高《〈说类〉序》即称:“余在留曹日,偶得一书,皆唐宋小说数十种,摘其可广闻见、供谈资者,录而存之,分类编次,以便观览”^[18]。

四、分类与编年混合体

许多小说汇编的体例并非单一的,而是兼用两种甚至多种体例,其中较突出者是分类与编年的混合体。王圻《稗史汇编》既仿类书体例分门别类编辑资料,同时其各类之下的条目编排又借用了编年体,其《引言》明确阐述总体构思:“总之为纲二十有八,列之为目三百有二十,而命之曰《稗史汇编》。是集也,分门析类,使人易于检索,而记事之次,一以世代

① 《说类》所据版本为明刻本。

② 《群书类编故事》所据版本为《笔记小说大观》(第三编)影印明刻本,台北新兴书局1985年版。

先后为序,俾将来作者,得随时随事而附入,此又命名之意也。”^[19]先按题材重点对辑录的说部资料进行横向分类,每类之中再依编年之体纵向编排。其选材下限虽止于明代,但后世可以递补,即“俾将来作者,得随时随事而附入”。如《稗史汇编》卷一百四十三“音乐门”,下分子类4个:乐律、乐府、乐舞、乐器,横向逐次展开。而每个子目之下,又依时代先后编次条目,如“乐律类”自伏羲作乐辨五音、黄帝命伶伦考八音、夏桀作烂漫之乐,至汉蔡邕《礼志》载军乐、晋孟嘉论乐、唐明皇立教坊,再至《宋会要》载钧乐(军乐)、宋瓦舍杂剧名目、金元诸宫调、唱赚、“说话”技艺、商谜、傀儡戏等,辑录历代有代表性的音乐事象,按时代顺序排比编写。这样纵横交织,组成时空一体的网状结构,横向的主题分类可以渐次增加,纵向的新条目可以随时补入,因此这是一种纵、横两种维度均可无限延伸的结构。

孙能传《益智编》四十一卷也采用了横向分类与纵向时序相结合的体例。一级类目14个,再分二级类目74个。每个子类之下的故事均按照时代顺序进行编排,如其《凡例》所说:“编次以时代为先后”,“自周秦迄于昭代,略为捃摭”^{[13]668}。这种混合体例的采用是编者自纵横二维认识世界思维方式的反映。

五、主题论证体

此类纂著一般也是分类或分篇编纂而成,每类(篇)之首或冠以小序,或先书议论,然后排比资料,验证其论点。宋代官修《册府元龟》即是这种体例。明代许多小说汇编以此方式编撰而成。清四库馆臣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所撰提要云:“其例立一标题为纲,而备引诸书以证之,大抵采自小说、杂记者为多……昔李昉修《太平广记》,陶宗仪辑《说郛》,其中譌怪居多,而皆以取材宏富,足资采择,遂流传不废。应秋此编,虽体例与二书小别,而大端相近。至来集之之《樵书》,全仿应秋而作。然有其芜漫,而无其博赡。”^{[16]1062-1063}来集之《尚湖樵书》十二卷、《博学汇书》十二卷均是这种体例。《四库提要》称《尚湖樵书》:“皆采摭唐、宋、元、明诸家之说,以类相从,排纂其文。而总括立一标目,或杂引古书而论之,或先立论而以古书证之。”^{[16]1127}毛奇龄《尚湖樵书序》称:“书凡若干编,编若干卷,不分部类门目,而任取一类之中,一目之内,牯其事之可相发者,鳞次栉比。”^[20]冯梦龙纂《智囊补》也是这种体例。其书分10部:上智部、明智部、察智部、胆智部、术智部、捷智部、语智

部、兵智部、闺智部、杂智部,每部之下再分二级类目若干。每部之首均有“冯子曰”《总叙》,每个二级类目之前皆有《小序》。如《明智部》下分《知微》《亿中》《剖疑》《经务》四类,其《明智部总叙》云:

冯子曰:自有宇宙以来,只争明、暗而已。混沌暗而开辟明,乱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水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锢,人不明则堕于云雾。今夫烛腹极照,不过半砖;朱曦宵驾,洞彻八海。又况夫以夜为昼,盲人瞎马,侥幸深溪之不覆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梦景,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为《知微》,为《剖疑》,为《经务》。吁!明至于能经务也,斯无恶乎智矣!^{[21]144}

二级子目《知微》之韵文《小序》云:“圣无死地,贤无败局。缝祸于渺,迎祥于独。彼昏是违,伏机自触。集《知微》。”^{[21]145}正文所辑诸智慧故事起到验证小序观点的作用,而诸《小序》又共同验证《总叙》论点。这样,每一部都结撰成一个结构严谨的版块,诸部又共同将全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充分贯彻纂者的意图与旨趣。冯梦龙编《古今谭概》三十四卷,分36部,每部之首均有《小序》。另如“世说体”的《何氏语林》三十卷,分38门,每门之首也均撰有小序,正文诸故事实际充当小序论据的功能。曹臣《舌华录》九卷,分17类,每类之首均有题“吴苑曰”的小序,申明辑录动机及本类故事主旨。如《俊语第十一》卷首:“吴苑曰:鸟俊则以为冠,兽俊则以为骑,人俊则逐睛,语俊则耸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爱俊而厌恶者,盖惟俊人能道俊语,岂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语第十一。”^{[13]622}此种体例实为纂者表达其学术或济世观点的一种方式。

当然,明代还有许多杂纂而成的小说汇编,为随手节录,裒合成编。如张翼、包衡同纂《清赏录》十二卷、马大壮《天都载》六卷,等等。还有的总体上分类,但类目之下的条目却编排无序。程铨、陈继儒编《古今韵史》虽分类编排,但每类之下的条目编排,不分时代先后。程铨《古今韵史凡例》说:“是编随读随纂,惟取其有当于韵云尔,若世之远近,事之古今,有未尽琐琐分别也。”^[22]除了小说总集,还有许多小说丛书也属于杂纂性质,如顾元庆《四十家小说》系列三部丛书,高承埏《稽古堂丛刻》十一种、黄昌龄《稗乘》四十二种,以及商濬《稗海》、江盈科《薛涛谐史》

等,均是既不分类,也不别时代,汇刻成编。

六、结 语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广泛汲取了各种传统文献编纂的经验,如史书的编年叙事、类书的分门聚材、志书的纲目隶事、论说文的举证以申理,等等。而其之所以能够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寄“我”精光,这与古代“小说”的本体性征有密切关联。古代“小说家”虽居于九流之外,被视为“小道”“末学”,但它又具有综括九流、博通四部的强大功能,明代学界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李维桢说:“班孟坚于刘中垒《七略》诸子十家,黜小说而存其九,九流名自此始。然而小说家实具有九流,故不易作。”^[23]陈继儒更张皇小说的巨大潜能:“六经之支流余裔散而为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盖其说靡所不载故也。”^[24]今人杨义阐释中国古典小说本体性时曾有一句很形象的论断:“小说如海,位低而纳众。”^[25]明代是小说观念成熟自觉的时代,其突出表征之一是,传统目录学中一直被隶于“子部”的小说公然向文学靠拢并逐渐混同于集部作品的迹象愈趋昭彰,如万历初王世贞别集《弇州四部稿》将“说部”与“赋部”“诗部”“文部”比肩并列,而在晚明学界,以“说部”指称“小说”的现象十分普遍。再如,极富文学性的传奇小说,一向不为“子部·小说家”所接纳,但万历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析分“小说家”为六种,第二种即为“传奇”。而明代文言小说丛书收录传奇作品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因此,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体例面貌与集部诸文类之关系也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重要话题。

参考文献:

- [1] 陈大康. 明代小说史[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530.
- [2] 陈国军. 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492.
- [3] 王伟. “说部”之概念辨析[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7(1): 104-112.
- [4] 李为善. 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4.
- [5] 施显卿. 古今奇闻类记[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247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2.
- [6] 穆希文. 说原[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07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246.
- [7] 焦竑. 焦氏类林[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1.
- [8] 陈邦俊. 广谐史[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252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9] 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671.
- [10] 程达. 警语类抄[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30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11] 余丹. 太平广记的编纂体例及其小说史意义[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8(1): 43-46.
- [12]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384.
- [13] 孙能传. 益智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43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14] 张涤华. 类书流别[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4.
- [15] 胡道静. 中国古代的类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8.
- [16]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7] 王昕. 志怪“小说”研究一百年[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4): 137-145.
- [18] 叶向高. 说类[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32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1.
- [19] 王圻. 稗史汇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39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533.
- [20] 来集之. 倘湖樵书[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46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1-4.
- [21] 冯梦龙. 智囊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22] 程铨, 陈继儒. 古今韵史[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48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693.
- [23] 李维桢. 天都载叙[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05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469-471.
- [24] 张大复. 闻雁斋笔谈[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子部第104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266.
- [25] 杨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4.

(责任编辑:陈丽琼)